

附錄四

教書匠與教育家

劉真

——做教育家困難，做教書匠亦不易。一個人要做教

書匠或教育家，只在內心一念之間的抉擇而已。——

一

我們在學校教書的人，都希望別人稱我們為教育家，而不願別人稱我們為教書匠。

那末，究竟教書匠與教育家有什麼區別呢？這倒是一個很有意義，但卻難以明確答覆的問題。

不過，如果有人問你：孔子是教育家還是教書匠？我想你一定會毫不遲疑地回答說：孔子是教育家而不是教書匠。

同樣，如果有人再問你：一個只知按時到校授課和拿薪水，但對學生生活和前途卻從不關心的教師，他是教育家還是教書匠？我想你一定也會毫不遲疑地回答說：這個教師只是教書匠而不是教育家。

由此可見，教書匠和教育家是有區別的。至少，在我們中國一般人的心目中（西方人也許無此觀念），教書匠和教育家是代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教師。

我們中國古代對教書的人，曾有經師與人師之分。如果以現代教育上的用語來說，經師大概係指偏重傳授知識技能的教師；而人師則係於傳授知識技能之外，且能對學生循循善誘，實施人格感化的教育。史載後漢陳國童子魏昭慕郭林宗之名，欲拜其為師，在初次謁見林宗時，即言「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意謂林宗為當代難得的人師，故求其收為弟子。以後一般人所說的「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兩句成語，可能便是由魏昭的話演變而來的。

因為古代的官學和私學，教學科目都非常簡單（通一經即可為師），更不似現今之講求教學方法。故當時說「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是並不錯的。可是時至今日，教育已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無論公私立學校，不僅教學科目門類繁多，而且教學方法日新月異，所以我們今天只應說人師固難求，經師亦不易得了。

如果把現在社會上所說的教書匠，比作古代的經師；所說的教育家比作古代的人師，那末，我們自然也可以說，今天無論做教書匠或教育家，都是很不容易的。

現在，先就做一個大家所謂的教書匠來說。

我們試從中國文字的字義來看，凡能稱為「匠」者，一定具有專門的技藝。而這種專門的技藝，大都需要相當的智慧和訓練才能習得的。又如中國常見的辭彙中所謂「匠心」「匠意」之類，更屬於

一種高度的心智活動。所以就匠字本身而言，並不含有輕蔑的意味。尤其在今日高唱職業平等、勞動神聖的社會中，木匠、鐵匠、泥水匠和從事其他行業的人，可以說受到社會上同等的重視。因此，我覺得一個教書的人，縱然被人稱為教書匠，也不要再在心理上以為貶損了自己的身價。

為什麼我說做一個很好的教書匠並不容易呢？因為在現在教育日趨專業化的時代中，要做一個很好的教書匠，至少應該具備以下幾項條件：

(一) 法定的教師資格 今天我們無論在中學或小學教書，一定要受過相當的師範教育。如果不是師範學校畢業生，就必須取得教育行政機關檢定合格的證書。此外，我們還要遵照政府的規定，不斷地接受在職訓練，如短期講習和進修等，藉以吸收新的觀念和知識。獲得個人職業的保障，而免為社會所淘汰。

(二) 豐富的教材知識 要做一個很好的教書匠，最重要的就是對於所擔任的科目，能夠勝任愉快。例如做小學六年級的國語或算術老師，自己就須先熟悉有關的教材知識，課前要編教案，課後要改作業，而且要盡量準備輔助教學的工具如幻燈、電影、標本、模型之類，以增進學生的了解。換言之，不僅要將課本教完，而且要把學生教懂。

(三) 純熟的教學方法 中小學與大學不同，大學的學生年齡較大，理解力較高，所以一個大學教授只要學問真正好，教學方法差一點還沒有很大關係。可是中小學的學生年齡小，如果教師的教學方法不能引起學生的興趣或學習動機，則教學的效果一定不如理想或事倍功半。所以要做一个優良的

中小學教師，僅僅具備豐富的教材知識是不夠的。還需要在所教的科目上，採用最有效的教學方法。

(四)專業的服務精神 我們看一般木匠、鐵匠或泥水匠，很少隨時中途改行，或與人訂立契約而不守信踐約的，這都是他們專業精神的表現。一個教師如果接收學校聘約以後，不能在校專心教學，或不遵守聘約的規定，甚至在聘期未滿時中途離校，另就其他待遇較優的職業，這便是缺乏專業的服務精神，可以說比木匠、鐵匠或泥水匠都不如了。所以要真正做一個很好的教書匠，這種專業的服務精神也是不可缺少的。

由以上幾點看來，可見教書而能達到「匠」的水準，也是需要相當的智慧、訓練和經驗的。所以我們教書的人如果被人稱作教書匠，亦不應認為別人對自己的職業有「不敬」的意思。不過就中國文化傳統的精神而言，我們社會上一般人都不僅僅把教書當作普通的職業，而且還視教書為一種神聖的事業。因此，我們目前正在學校教書或將來準備在學校教書的人，都不應把自己一生只限於做一個普通的教書匠，而與從事其他行業一樣，僅求在工作上謀得個人或一家的溫飽。我們必須在人生的旅途上，懷有更遠大的理想，追求更高一層的境界。這就是說，我們教書的人應從做一個很好的教書匠為起點；繼續不斷地充實個人的精神修養，進而成為受到社會普遍尊敬的教育家。

三

其次，我們便要研究怎樣才配稱作一般人心目中所尊敬的教育家了。

在我看來，凡能被稱為教育家者，必須具備以下幾項不可缺少的精神：

(一) 慈母般的愛心 慈母的愛心，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我們都知道母親對於子女，無論其智愚美醜富貴貧賤，無不同樣加以愛護，甚至對幼年時心智肢體稍有缺陷或成家後境遇較差的子女，更特別發揮其愛心，予以更多的照顧。母親對於子女，可能有溺愛的情形，但絕少偏愛的意念。我們教書的人如果想做一位教育家，首先便要具備這種慈母般的愛心。對聰明的學生固會樂予施教，對愚笨的學生也應善加誘導（不應僅以教育「英才」為樂事）；對面貌俊秀的學生，固然覺得討人喜愛，對肢體殘障的學生，也不能有所歧視。至對宗教信仰經濟環境不同的學生，自然亦應抱著有教無類的態度，發揮相等的愛心，施以完善的教育。甚至對家長犯有罪刑的學生，也不能表示輕鄙的態度，因為家長縱然不好，學生卻是無辜的。近代瑞士的大教育家裴斯塔洛齊，不是一生以教育孤兒貧兒為職志，而被稱為「孤兒之父」與「貧者之友」嗎？可見凡被稱為教育家者，都是具有這種慈母般的愛心的。自然教育家的愛心亦即所謂「教育的愛」，與一般父母對子女的愛心，在本質上多少有些不同。因為父母對子女的愛心，固然發於人類自然的天性，但亦有少數為父母者對子女的愛心，仍存有「養兒防老」的期待報酬的心理。可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對學生的愛心，卻是只有「給與」而不望任何「報酬」的。也可以說，教育家的愛係源自教學過程中所獲得的心靈上的滿足，是以整個的教學過程為愛的對象的。所以如果就「愛的境界」而言，教育家對學生的愛心也許更高於父母對子女的愛心吧！

(二) 園丁般的耐性 俗語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可見種植樹木和培養人才都是要花費一段

相當長久的時間的。有些教師自喻為培育民族幼苗的園丁，就是這個道理。要做一個好的園丁，最重
要的就是要具備最大的耐性。因為無論種植花草樹木或五穀雜糧，都要經過播種、施肥、除草等不可
缺少的步驟。有時若遇天災蟲害，每使終年辛勞，毫無所得。如果要使農作物改良品種的試驗，則所
需時間更久，常在數年或十多年以上。所以作為一個園丁或從事園藝工作，必須具有只問耕耘不問收
穫的精神。這種精神自然需要一種最大的耐性來支持。明代王陽明嘗以草木的生長譬喻兒童的發育，
如云：「童蒙之性，樂喜遊而憚拘束，如草木之萌芽，舒之則生長，撓之則衰萎。故教兒童，鼓舞其
趨向，喜悅其中心，則日進而不已。譬如草木之霑時雨春風，則萌動而長。剝落冰霜，則蕭瑟而枯
焉。」這就是說教師教導兒童正如園丁對待草木一樣，一定要有最大的耐性，聽其舒暢發育，自然成
長。反之，如果缺乏耐性，便會如孟子一書中所說宋人「揠苗助長」的故事，結果「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其實不僅做一個教師需要耐性，即從事其他任何工作，亦無不需要很大的耐性。從前官場中
傳說有一則趣事：「一仕宦將之官，其厚友送之，囑曰：『公居官無他難，只要耐煩。』」仕者唯唯而
已。再囑，三囑，猶唯唯。及至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為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數
四？」厚友曰：「我才多說兩次，爾遂發怒，輒謂能耐煩可乎？」從這則趣事來看，可見要一個人
具有不怕煩的耐性是很難的。不過一個做教師的人，如果在教學生時缺乏耐性，便很容易產生揠苗助
長的不良後果。根據最近臺北市教育局和衛生局合作調查四萬四千名國民小學一年級學生視力的結果，
證明視力不良與進幼稚園有關，因為臺北市的幼稚園大部分都教幼童讀書寫字，再加上課室中光線不

佳，許多孩子的眼睛就因此受損了。所以中央日報特發表短評一則，呼籲幼稚園的老師勿揠苗助長。（見六十五年五月二十日中央日報第三版）由此看來，要作為一個教育家，耐性和愛心是同樣重要的。

（三）教士般的熱誠 凡是身為傳教士的人，大都具有為宗教而奉獻一切的熱誠。試看許多神父、牧師或修女們，他們寧願犧牲個人的自由和享受，為傳佈宗教教義，救人救世，摩頂放踵，在所不辭。古今中外這種宗教家的偉大事蹟，真是不勝枚舉。我過去在臺灣省教育廳服務期間，曾遍至臺灣各偏僻地區，我發現凡是有我們警察派出所的地方，幾乎都有外國或中國的傳教士所建立的教堂。我也看見有許多外國神父牧師修女們，在花蓮臺東兩縣荒遠的山地，開設醫院教堂為山胞醫病傳教，積年累月，樂而不倦。所以我認為要想作一個教育家，就應該像這班傳教士們具有為教育而獻身的精神，也就是我常說的「教育即奉獻」的意思。以前我在主持政大教育研究所期間，特別舉辦過一次有系統的「宗教哲學」方面的專題講演。就當前對社會影響力較大的各種宗教，敦請大家平素所最敬佩的宗教家或富有研究的學者，作一系列的專題講述。我並非要研究所的同學將來成為某一宗教的信徒，而只是希望各同學在聽過此項講演之後，能於其生命中多少滋生一點宗教的意識，培養一點宗教的情操，使他們性靈上得到一種啟示，從而了解人生不僅要注意物質生活，而且更要重視精神生活。物質生活的滿足，常須仰賴於外力；精神生活的滿足，則可求之於內心。一個具有高度宗教修養的人，但不屑措意於世俗的榮辱得失，聲色貨利，甚至對最重要的生死關頭，也都看得很輕。如果從事教育工作的人都能具有這種宗教家的修養和熱誠，則教育界自然不會發生敗壞風氣的事了。所以我認為要

作一個教育家，是應該像傳教士般的具有為教育而獻身的熱誠的。

(四) 聖哲般的懷抱 在我們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中，宗教雖不似西方社會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但教育卻在我們中國社會發揮與西方宗教相同的作用。故有些國家常視我們的儒學為儒教，尤其我國古代大儒，其傳道、弘道乃至殉道的精神志節，更可與西方若干宗教家相媲美。所以我常以為：我們古代的一些大儒，他們本身也許沒有任何宗教的信仰；但是他們的立身行事，卻於無形中表現了宗教家那種崇高的人格與風範。不過我國的教育家與西方的宗教家有所不同者，即西方宗教家乃至一般宗教家多以勸導世人擺脫現世享受、追求來世永生為其教義的重心；而我國歷來的教育家則以教育世人改造現實社會增進現世幸福為主旨，而不願涉及人類死後一切不易確知的問題。故孔子嘗謂「未知生、焉知死」，更甚少語及「怪力亂神」。所以我們可以說：宗教家是要在人類死後建立一個理想的天國，使生前行善者（基督教所謂行義的人），能在未來的天國中享受榮耀。而教育家則是要在現實的社會中建立一個理想的天國（大同世界），使努力工作有所貢獻者能在其生前（現世的天國）獲得幸福。我們中國的至聖先師孔子，便是這樣一位偉大教育家的典型。他一生有教無類，弘揚仁道，即在謀求為人類建立如「禮運篇」所言的那樣一種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使人人各得其所，各遂其生，過一種理想的美好生活。宋代大儒張載所謂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亦即我們中國歷代教育家的共同的懷抱。換言之，我們中國教育家大都具有「天人合一」「民胞物與」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在其傳道授業解惑的生命過程中，不僅對自己的學生負責，對自己的民族

負責；而且對歷史文化負責，對宇宙人類負責。所以中國數千年來政治上的朝代（政統）雖不斷更迭，但我們民族文化的一貫道統，卻賴歷代教育家的薪火相傳得以綿延不絕。反觀今日西方的教育界，除少數具有遠見的教育家外，很多已經喪失了對理性的真誠與道德的勇氣。最近（六十五年三月一日）蘇俄一位著名的流亡作家索忍尼辛在英國廣播公司電視節目「大千世界」中對英國人很感喟地說：「西方文化之所以日漸走向危險的邊緣，主要由於年長的一代放棄自己的權威和責任，聽任年輕的一代胡作非為。學者、教授和專家都不肯直抒己見，為真理辯個分明。」如果今日西方的很多學者、教授和專家誠如索忍尼辛所說的情形，則他們所最缺乏的不正是我們中國教育家所具有的聖哲般的那種懷抱嗎？

四

由以上所述看來，可見所謂教書匠與教育家之間的區別，不在外表的形相，而在精神的內涵。因為教書匠與教育家的人生境界不同，所以他們表現於實際教育工作方面者，也有很大的差異。大體言之，可以分為以下幾點：

第一、教書匠教的對象是以「書」為重心的；而教育家教的對象是以「人」為重心的。教書匠只求把書本上的知識灌輸給學生（甚至只是把課本教完，並不求把學生教懂。）；而教育家則於傳授書本上的知識以外，並注意於學生整个人格的發展，亦即特別注重指導學生做人的道理，要盡心把學生

教「好」。據宋元學案載稱，宋代大教育家胡瑗在徐積初次謁見問學時，「積頭容少偏，瑗即向其厲聲云：『頭容直！』積猛然自省，不特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是不敢有邪心。」我們知道，徐積在向胡瑗問學時，已經是一位學術造詣頗深的年輕學者了。但胡瑗對於這樣一位首次求見的學生，在一種細微末節的小事上，竟如此毫不客氣地嚴厲指責，可見中國古代教育家對於指導學生做人是如何地重視！徐積聽了胡瑗一句簡單的告誡以後，儼如當頭棒喝，猛然醒悟，以後也成為宋代一位著名的理學家，真是有其師必有其弟了。因為古代為教師者對學生有如對待自己的子弟，所以學生對教師亦如對待自己的父母。如宋元學案即曾言「胡瑗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孔子歿後，子貢廬墓六年，有逾人子守制盡孝之禮。這更足證明古代師生關係之深厚。其所以能如此者，自然是由於古代教師對於學生特別重視教以做人之道了。

第二、教書匠是以言教為主；而教育家則是於言教之外更重身教的。孔子曾說：「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孔子以後歷代的大儒和教育家，亦大都能以言弘道，以身示範。宋代王安石當朝時，皇帝請他教讀。安石要求自己坐講，皇帝立聽。人問之，對曰：我坐而講，皇帝立而聽，我並非要皇帝尊重我個人，我是要學生尊重老師，要皇帝尊重我所講的「道」。我既然提倡師道，我自己怎可不身體力行呢？安石這段話，正可說明古代做教師的對於身教的重視。因古代的教師注身身教，所以對於個人的言行，無不自律極嚴。史載「胡瑗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見安定學案）不僅中國如此，甚至外國人受了中國儒家思想影響的教育家，亦莫不如此。例如日本江戶時代的大儒

佐藤一齋即嘗云：「以春風接人，以秋霜自肅。」可見所謂師嚴道尊的「嚴」字，重在嚴以律己，而不在對待學生態度嚴厲。今日少數學校教師任意體罰學生，折磨學生，那是根本誤解嚴字的意思，不能「整肅」自己而只知「整肅」學生了。可見教師要實行身教，必須認真下一番克己的功夫，先求自身的健全了。而在另一方面，做教師的如果自身健全，並能以「愛之深責之切」的心理教導學生，則學生一定心悅誠服，樂於受教。對教師不僅不致有嚴厲的感覺，而且會體驗到「教育之愛」的溫暖。師生之間，輕鬆愉快，其樂陶陶。如朱熹之於周敦頤則曰：「風月無邊，庭草交翠。」郭林宗之於黃叔度則曰：「汪汪若千頃波。」朱光庭之於程顥則曰：「在春風中坐了一個月」從古人這些頌揚偉大教育家的語句，便可看出身教所予學生精神感受之深了。

第三、教書匠對教育工作是不一定視為樂事的；而教育家則對教育工作總是內心感到非常快樂的。因為教書匠把教書當作一種普通的職業，往往對所任課業的輕重，所獲待遇的厚薄，斤斤計較，甚至以此為應聘或轉業的主要條件。但是教育家則不同。教育家視教育為神聖的事業，固非完全不重視物質生活，但更重要的卻在求教學過程中心靈的滿足，把學生的成就視為自己的成就，享受教育工作給予的精神上的收穫。孔子一生中所表現的樂道自得的精神，便是最好的說明。所以論語述而篇孔子自述說：「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綜觀論語一書中提到樂字的有四十五個之多，卻未嘗見一苦字。孔子一生所以能「學而不厭

，誨人不倦」，可以說便是由於把教育工作看作一件最快樂的事情。此外，即使從功利的觀點來看，教育工作也是值得令人快樂的。梁啟超氏在「教育家的自己田地」一文中曾說「無論做何種職業的人，都各有各他的自己田地，但要問那塊田地最廣最豐富，我想再沒有能比得上教育家了。教育家日日做的終身做的不外兩件事：一是學，二是誨人。學是自利，誨人是利他。人生活動目的，除卻自利和利他兩項外，更有何事？然而操別的職業的人，往往這兩件事當場衝突——利得他人便不利自己，利得自己便不利他人。就令不衝突，然而一種活動同時具備這兩方效率者，實在不多。教育這門職業卻不然，一面誨人，一面便是學，一面學一面拿來誨人，兩件事併一件做，形成一種自利利他不可分的活動。對於人生目的的實現，再沒有比這種職業更為接近更為直接的了。」梁氏這段話，正是老子所云：「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的意思。我想一個做教師者如果能有這種想法，還會不感到無比的快樂嗎？

第四、教書匠所發生的影響是短暫的；而教育家所發生的影響則是久遠的。因為教書匠只知道教書，對學生的一切毫不關心，所以他所發生的影響，往往只限於聽其講課的少數學生，與其在學校教書的短暫時期。他所教的學生畢業離校以後，恐怕很快就把這位老師完全忘記了。至於可以被稱為教育家的教師，因為他除教書以外，能對學生發揮充分的愛心與熱忱，把自己全部的心血灌注到學生身上，所以他的一言一行，可以影響到學生的終身。如徐積嘗言：「吾於安定之門，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違也。」（見安定學案）甚至古代很多名師的教澤，不僅直接影響到自己教過的學生，而

且還會對沒有親自受教的人發生間接的影響。歷史上不是有很多偉大的教育家除了自己的及門弟子以外，還有不少所謂私淑弟子嗎？中國孔子、孟子、朱子（熹）的影響，不僅及於當時，而且一直延續到今天；不僅及於中國，而且遍及其他國家。西方的康德、裴斯塔洛齊、杜威不也都是如此嗎？所以我常以為一位真正偉大的教育家，他的生命是永遠活在世人心中的，中國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教育家可以說最容易做得到了。試想一位教育家如能循循善誘，教而不倦，使學生變化氣質，德業日新，這能說不是立德嗎？試想一位教育家如能在教育制度或方法方面有所創新，如胡瑗之建立宋代大學分科教學制度，如德國赫爾巴特之創立五段教學方法，無不在教育方面具有極大的貢獻，這能說不是立功嗎？試想一位教育家如能於教學研究之餘，創立一種有價值的學說，完成一部權威性的著作，改變教育上舊的成見，建立新的觀念，這能說不是立言嗎？古今中外能一身而兼具此三不朽的貢獻的教育家實在太多了。美國麥克阿瑟將軍曾謂「老兵不死」，現已成為舉世皆知的名言，實則歷代具有偉大貢獻的教育家同樣是不死的。正如聖經上所說，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了，更可結出許多子粒來，這也就是清代一位大教育家李恕谷所謂「造人以求此身之不死」的意思了。我們可以說：直到今天，孔子、孟子、朱子沒有死；康德、裴斯塔洛齊、杜威也沒有死！所以我們正可套用麥克阿瑟將軍的那句名言說：「老師不死！」

五

關於教育家應具備的精神內涵，以上只概括地列舉四點加以闡述。也許有人看了以後會問：依照以上幾項標準，做一個教育家豈不是太難了嗎？也許只有歷史上少數幾個特例可以作為示範，一般教書的或從事其他教育工作的人，對於此項標準恐怕是高不可攀吧！也許有人更認為在今天工商業社會及班級教育制度之下，一般人的價值觀念與客觀環境已與往昔大有不同，本文所述教育家應具備的精神修養等等，不免是一種教育上的高調，一篇空洞的理論而已。但是我個人卻有另外一種想法，我覺得如果我們要維護中華民族重視教育的優良傳統，拯救世界文化的危機，則我們對於從事教育工作者應具備的條件，似不能不作較高的要求。這也就是蔡元培氏所謂教育家應以現象世界（現實）為出發點，而以實體世界（理想）為追求的目標的道理。其實，我認為我們教書的人要做一個教書匠或要做一個教育家，只是在內心一念之間的抉擇而已。佛家說：「境由心造」，又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昨天也許是一個誤人子弟的教師，或是教育界的一個「混混」（姑且借用社會上對一般不務正業之徒的通稱）；今天只要念頭一轉，便可令人刮目相看，變成受到尊敬的教育家。基督教中一位最著名的使徒聖保羅，最初不僅不信仰耶穌，而且多方迫害其教徒。可是有一次前往大馬邑時，中途突然有所感悟，遂下定決心皈依耶穌，從此盡力傳播基督教義。後竟以身殉教，成為基督教中的聖人。可見一個教書的人，只要決心成為教育家，並不是很困難的。孔子嘗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云：「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吾未見力不足者。」又云：「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周敦頤所謂「士希賢，賢希聖」，都是說我們只要能高尚其志，自強

不息，就不難達到我們理想中的人格標準了。因此，我覺得一個普通的教書匠，只要能改變觀念，下定決心，使自己對於教育工作具備一種偉大的愛心、耐性、熱誠與懷抱，則便可立即由教書匠變為教育家了。

不僅我們教書的人可以由一個普通的教書匠變為一個偉大的教育家，即從事一般教育行政工作的人，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常以為所謂「教育行政」這四個字的意義，應該把「教育」和「行政」分開來看，就是以教育為目的，以行政為手段。所以凡身為教育行政人員者，應該是為教育而辦行政，不能只辦行政不辦教育。（當校長的辦學校行政也是一樣，不能只辦行政不辦學校。）果能如此，則這位教育行政人員便可被稱為具有教育家精神的教育行政人員了。

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從事教育工作的人，無論是教書或辦理行政，更無論職位的高低，（實則教育工作乃係對人類文化負責的神聖事業與良心工作，社會上是不應對教育工作者有職位高低之分的觀念的。）只要具備偉大的教育愛心、耐性、熱誠與懷抱，一個幼稚園的老師也可算是教育家；反之，如果缺乏這種偉大的教育愛心、耐性、熱誠與懷抱，即使身為大學教授亦僅能算是教書匠，而不配稱為教育家。同樣，從事教育行政工作也是如此，如果具有以上各種精神上的條件，則可稱為教育家；否則，便只能算是一個普通的教育行政人員而已。

民國四十七年七月，梅月涵（貽琦）先生就任行政院教育部長時，在第一天交接典禮後曾對部內同仁說過幾句簡單而寓有深義的話。他說：他希望教育部同仁要時時刻刻想到「教育」兩個字，而不

要時時刻刻想到「部」這個字。因為「教育」是工作，「部」是機關，如果只想到「部」這個字，便容易形成「坐衙門」的官場現象；如果只想到「教育」這兩個字，便會只知道專心辦教育而無所旁騖，使教育部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富有學術氣氛的機關了。梅先生素以沈默寡言著稱，但卻言必有中。他這幾句話，便充分表現出一位教育家的偉大精神。

總之，我們無論在學校教書或從事其他教育工作，只要我們能夠具有偉大的教育愛心、耐性、熱誠與懷抱，則任何人都可由一個普通的教書匠或教育行政人員變為受人尊敬的教育家。因此，我常希望一般師範學校或師資訓練機構，最好能指導學生多讀一些哲學、宗教、歷史、文學以及教育家傳記之類的書籍，使學生藉以提高其人生的境界，認識人生的真義，建立正確的人生觀；並從而養成其「教育之愛」的情操，堅定其為教育而獻身的精神與志節。如果僅僅注重教材知識與教學方法的傳授講習，則結果就很難把學生培養成為目前教育界所最需要的教育家了。

今天要端正教育界的風氣，達成良師興國的使命，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我們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尤其負有創造人類心靈的神聖任務的教師們，能樹立新的觀念，表現新的精神，抱「一起衰振弊」的宏願，作「盡其在我」的努力，不憂不懼，立己立人。起碼先要做一個負責盡職的教書匠，更進而做一個為人師表的教育家。只有這樣，我們建設國家的精神基礎，才能日益穩固；而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文化，也不難發皇光大弘揚於世界了。（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在臺灣省國校教師研習會講演後寫成。原載六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中央報副刊。）